

新中国70年的变与不变

□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新中国70年发展有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一是在国家发展目标的具体提法上有过变化,但是要用50年到10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始终没有变过,并且一代代人在围绕这个大目标而不懈奋斗。二是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有许多变化,但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大方向,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变过,并且一旦出现偏差,总能及时加以纠正。三是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形式、做法上存在不少变化,但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始终没有变过,并且注重总结经验与教训,以期在不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前提下,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四是在国际问题、对外关系和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具体提法、做法上有不少变化,但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捍卫自身核心利益、永远不称霸的决心,始终没有变过,并且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而愈益坚定。

[关键词]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对外关系和维护祖国统一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1-0020-06

新中国与近代中国相比,仅仅经过70年、大约三四代人的时间,便由一个经济落后、四分五裂、战乱频仍、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一跃成了独立统一、社会稳定、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具有中期工业化水平和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主义制造业大国。对于这个变化,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但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对于这个变化是否会持续,会朝什么方向变化,抑或中国继续强大后是否会称霸等等,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说穿了,无非是怀疑中国会不会“变色”,会不会“崩溃”,会不会“威胁”别国。产生这些怀疑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有一个原因不能不看到,就是这些人只注意了新中国70年来的变化,而对70年始终没有变的东西却注意不够,或者注意了却没有在意。然而,上述问题的答案,恰恰就在这变与不变的关系之中。

[收稿日期]2019-10-25

[作者简介]朱佳木(1946—),男,江苏南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云生平与思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首先是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而成立的。但是,由于它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一部分与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对帝国主义有着巨大的依附性,另一部分又具有天生的软弱性,所以,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重任,不得不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和其他主张中国工业化的政治力量不同,它认为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打倒挡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并且为此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推翻了这“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鉴于当时的近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不到,而且财政严重匮乏,人才极其缺少,不具备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所以,一度决定在新中国建立后,先用一个较长时间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利用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着重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便积累资金和物质,同时培养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然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突显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紧迫性;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又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于是,党中央改变了原先的设想,决定立即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用三到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党中央为加快工业化建设步伐,提出“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的口号,并为此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走出一条低投入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然而,由于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加之遇上连年自然灾害,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相反,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从而不得不进行政策和经济结构、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导致第二个五年计划推迟了三年才完成。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之时,周恩来总理又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改变了过去只讲工业化的目标,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并且第一步先在1980年以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随后,我国用了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终于如期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国内经济的实际情况,在原有“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先用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再用10年,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再用50年,在21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说,经济发展分三步走,“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P251}。随后,我国用了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果然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21世纪初,党中央鉴于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

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经济、社会还存在不少问题,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之前,再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用20年时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且提出要走出一条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鉴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20年即将实现,又通过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前的30年,再分两步走,第一步用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再用15年,到本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毛泽东在1962年说过:在我国,要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2]P302}。从新中国7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在国家发展目标的具体提法上,我们虽然有过这样和那样的变化,但是,要用50年到10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却始终没有变过,并且,一代又一代人在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不懈奋斗着。

二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党,但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没有采取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种从一开始便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而是将革命分为了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们并没有马上就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了几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并相应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时我国资金和物资匮乏、人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为解决这个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并且借鉴苏联工业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选择了能集中使用有限资金、物资、人才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

生产资料实行单一公有制和经济运行实行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制,为以后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起到了必要的和历史性的作用。但是,也因此给经济带来管理死板、活力不足、反应迟钝、产品单一的弊病。针对这个问题,党中央曾设想在坚持国家和集体经营、国家计划生产、国家统一市场这三个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作为三个补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不仅未能实行,相反,在管理上统得比过去更死了。不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社为核算单位的做法,却逐渐降到了大队,又由大队降到了小队,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正面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冷静分析,认识到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决定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总方针,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和土地承包,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在计划中减少指令性、增加指导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大对轻工业、服务业的投入,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允许发放奖金,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举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等。

90年代初,我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情况的改善,逐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和日用轻工业品供应的限制;又随着经济规模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的大量进城,以及企业普遍实行股份制,使资本、产权、技术、劳动力、证券、期货等市场逐渐形成。于是,党中央决定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且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鉴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我国经济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握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20多年来,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仍然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党中央又提出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鉴于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党中央强调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中,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针对一些人只关注中国的开放政策变不变的现象指出:“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1]P251}从新中国7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我们确有许多变化,但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大方向,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指导思想,却始终没有变过,并且,一旦出现偏差,总能及时加以纠正。

三

夺取政权以后,如何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使执政党不脱离群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胜利前夕就开始考虑的问题。为此,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党结合中国国情,借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做法,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在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上,以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和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为了防止党的干部在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蜕化变质、以权谋私、当官做老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树立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还决定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级别、军队取消军衔制,并接连进行了“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整党整风运动。

此后,为吸取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教训,我们党又开展了反修防修斗争,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让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并从工农兵中直接提拔领导干部。这种做法严重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加之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大批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干部、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使大批造反起家的“三种人”窃取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克服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不再采用过去那种疾风骤雨式的运动方式,而是着重从制度上入手,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针对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实际状况,规定商品交换的原则不得进入政治领域,担任公职的党员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重申矿藏等自然资源和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严格防止私人资本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

为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头10年的30年间,我们党先后进行了80年代中期的整党和90年代初期、后期的党员重新登记、“三讲”教育,以及21世纪初期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3]P273、27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所面临的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严峻性,提出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

坚持反腐败无禁区、零容忍,并在全党范围和县级以上干部中分别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主题教育,目前还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时,逐步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反复提醒全党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4]P42}从新中国7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形式、做法上,确实存在不少变化,但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却始终没有变过,并且,注重总结经验与教训,以期在不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前提下,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

四

近代中国有着被帝国主义长期侵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贸易禁运。这个经历决定了,新中国必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然积极争取世界的进步与和平,必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必然主张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必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身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刚一成立即宣布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当美国出兵侵占台湾海峡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时,虽然我国当时尚处于长期战争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存在巨大差距,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投入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作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并明确表示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可以暂时不变。然而,当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于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后,党中央不仅下令坚决迅速地予以平息,而且改变了原有政策,在西藏进行了彻底的民主改革,废除了黑暗的农奴制度。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采取了很灵活的策略,一方面通过炮

击金门,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另一方面通过特殊管道,向蒋氏父子表示,只要台湾肯回归祖国,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均可保持现状,从而为后来的“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最初蓝本。

面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和来自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理论,作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论断,并同亚非拉民族独立、人民革命运动相互鼓舞、相互支持。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而进行冷战时,毛泽东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先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划分”等主张和理论,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并借此打开了长期僵持的中美关系,为同资本主义世界开展经济往来铺平了道路;同时,指导我国大力加强“三线”建设和战备措施,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核袭击。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改变了前一时期关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观点,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两个主要问题的论断。同时,我们党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合作,仍然作为新时期的基本外交政策,全方位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八九”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所谓制裁,对此,邓小平尖锐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1]P320}。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他又提出对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方针,使我国平稳度过了世界大变动、大动荡的历史关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捍卫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台湾方面达成了“九二共识”,实现了“三通”,收回了港澳主权,并在两地分别实行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我们党还准确把握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点,顺应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作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外交布局,先后与有关国家一起启动了中—东盟自贸区,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中非定期协商机制和合作平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同时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正日益突出,强调当今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要求干部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对时代性质和特征保持清醒认识的前提下,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积极参与已有国际对话和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倡议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明确表示中国既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也不会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推动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公平、合理及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从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的总国家安全观,把安全问题由国际、治安等传统领域,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太空、深海、极地、生物及海外利益等领域,鲜明地提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必须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正确把握好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对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势力绝不能手软,从而进一步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也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利益。”“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5]从新中国7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在国际问题、对外关系和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具体提法、做法上,我们也有不少变化,但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捍卫自身核心利益、永远不称霸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变过,并且,随着形势的

不断发展而愈益坚定。

当前,新中国仍然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未来的变化会更多更大。但只要了解了过去的变与不变,对新中国在70年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能否持续,中国今后会不会“变色”,会不会“崩溃”,会不会“威胁”别国等等,也就不言自明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7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

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6]。今后的前进征途上,我们将会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他还说“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6]这一对新中国的过去、今天、未来的扼要概述,无疑是关于新中国变与不变问题的最权威最有力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6]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10-01.

The Changes and the Unchanged through the 70 Years of the New China

ZHU Jia - m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70 years of the new China ,there are not only a lot of changes ,but also a lot of things unchanged. First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concrete state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however ,the big goal of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ithin 50 to 100 years has never changed ,and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have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achieving this big goal. Second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guideline and policie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however ,the basic direction of sticking to the basic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ching forward from socialism to communism and the guiding thought of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in all and mobilizing the activity of the people to the hilt have never changed ,and any deviation can be rectified timely. Third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specific forms and practices of party building; however ,the tenet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the organic unity of people sovereignty with the Party' s leade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flesh - and - bl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nd the guideline of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have never changed ,and experiences have been summarized and lessons drawn timely for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never hinder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urth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concrete statements and practices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issues ,foreign relations ,national u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however ,the determination to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poch ,strive for and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defend the core benefits of our country without seeking hegemony has never changed ,and this determination has become ever - increasingly unswerving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Key words: new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economic construction; party building; foreign relations and safeguarding of national unity

(责任编辑:邱明)